

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苏轼在徐州文化研究”项目

遗爱子载舜徐州

——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

蔡世华 管仁福 编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项目

“苏轼在徐州文化研究”项目

遗爱子载苏轼徐州

——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

蔡世华 管仁福 编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 / 蔡世华,管仁福编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46-3816-0

I. ①遗… II. ①蔡… ②管… III. ①苏轼(1036-1101)—人物研究②苏轼(1036—1101)—宋词—诗歌研究
IV. ①K825. 6②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144 号

- 书 名 遗爱千载苏徐州
——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
- 编 著 蔡世华 管仁福
- 责任编辑 侯 明
-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 出版服务 (0516)83884895 83884920
-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305 千字
- 版次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苏轼在徐州文化研究”
系列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莫砺锋 周裕锴

主 任 王希龙 罗承选

编 委 庄汉新 蔡世华 管仁福
 阎续瑞 周凌云 邓心强

序

罗承选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成立已经六年多了。还记得2011年5月的成立大会上，与会的各位领导嘉宾对研究院发展前景的美好祝福与热情期待，也没有忘记有些专家和同仁的疑虑担心——高校中这种“三无”（无行政职级、无专职人员、无稳定经费）的挂牌式学术组织，其学术研究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其开幕式，也是闭幕式。苏轼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能否持久？

现在回顾一下六年来的苏轼研究院，它的存在状态和学术成果，与大家的期望相比，的确还有相当距离，但也没有成为“僵尸”或名存实亡；相反，凭着校内外有关方面的关心与支持，凭着各位师生的努力与坚守，它还是生存了下来，且还小有作为。它如山野小溪，虽几无声息，却不绝如缕，潺潺潜行，于缤纷绚烂的大学学术组织的丛林中，形成了一道虽不显眼而尚可观的风景。目前，苏轼研究院已经拥有了几十平方米的图书资料室，购置了有关苏轼的主要作品和研究资料；先后与四川眉山三苏文化研究院、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诸城苏轼文化研究会、常州苏轼研究会、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建立了互通研究信息的交流关系；邀请了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莫砺锋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周裕锴教授、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的张仲谋教授等多位学者来校讲学。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苏轼在徐州期间的政务与文学活动，研究院副院长管仁福教授等老师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先后在《中国学术研究》、《船山学刊》、《大家》、《齐鲁学刊》、《苏轼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申请校级研究课题获得立项资助，积三年之功，编辑出版了《苏轼徐州诗文辑注》一书，此书是苏轼徐州作品目前最全面的辑注本，为苏轼在徐州的文化研究和广大的苏轼爱好者提供了简明厚实的阅读文本，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今年是苏轼诞辰980周年，适值苏轼知徐州940周年，管仁福、闫续瑞两位教授还先后在徐州市

云龙书院和矿大镜湖大讲堂开设讲座，以资纪念，听者反映良好。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苏轼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已招收了五个年级共八名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四名，还有四名在读。自2014年开始学校领导同意每年拨给苏轼研究院两个研究生招生名额，以加强对苏轼文化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使苏轼文化研究后继有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既培养了人才，也结出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本书就有三篇论文节选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三篇论文功底扎实，角度新颖，多有新意，其中有一篇还被评为中国矿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总之，成果在积累，队伍在成长，平台在拓展，影响在形成，从而为中国矿业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徐州城市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就是苏轼研究院经过六年努力取得的点滴成就。

这些点滴成就的取得，有首任院长王希龙先生的筚路蓝缕、谋划指导，有中国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教授、校科研院和公管学院负责同志的鼎力支持，更有热爱苏轼、研究苏轼的诸位教授、副教授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与执着。几年来，我和他们一道，积极支撑、推进苏轼研究院的生存与发展，牵头研讨学术方向，明确科研课题，落实任务分工，调度工作进展，协调解决问题。我认为，要研究苏轼、评价苏轼，首先要感知苏轼、学习苏轼，为此，我曾带着研究院师生走遍徐州城内外，踏着当年苏轼的足迹，重温苏轼身先士卒、抗洪保城的壮举；我们曾前往湖北黄州，拜访了黄冈市苏轼研究会，登上千古赤壁，感受当年苏轼吟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至于苏轼的故家四川眉州，也就是我的家乡，“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是苏轼对于家乡美景的深情吟唱，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乡愁，总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不仅因为这种老乡情结，更因为对苏轼精神人格和人生态度的高度认同与无限敬仰，我对于中国矿大苏轼研究院的存在与发展，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牵挂，心甘情愿在退休之后，继续为它摇旗呐喊，添薪续火。我希望研究院的各位同仁能坚守自己的方向，不浮躁、不功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正如苏轼所说“何妨吟啸且徐行”，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淡定从容，潜心研究，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按照既定的研究计划，继《苏轼徐州诗文辑注》一书出版后，由蔡世华副教授和管仁福教授编著的《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也即将付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也是经过集体研究商定的，该书正是研究院各位老师和学生围绕这一题目的研究成果汇编。尽管苏轼在徐州的时间不长，但其足迹所至，留下的文化遗存很丰富，而这些文化遗存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

具有当代意义,它们与徐州这座城市相生相伴,从历史一直走到今天,还将走向未来,始终是徐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色亮点,也必将成为徐州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中有些认识与感悟也许并不都是全新的,有的还会给人似曾相识的印象,这其实很正常。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重温苏轼徐州文化遗存,都会有相似而不相同的感悟与收获,我们不仅为苏轼而感动,也因前人的感动而感动,也希望后人因为我们的感动而感动,历史与文化就是这样被传承着、被书写着、被演绎着、被创造着。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或能有助于苏轼文化学术研究的疆域拓展,同时也为中国矿业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徐州市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苏轼研究院的研究范围,并不囿于在徐州时期的苏轼,如果把苏轼生平比作一条蜿蜒曲折、起伏跌宕的河流的话,徐州时期只是其中精彩的、跳跃的一段。苏轼晚年自己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虽然道出了他深刻的人生况味,但也提醒我们,要完整全面认识徐州时期的苏轼,需要跳出徐州看苏轼,应在北宋政治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大舞台上了解苏轼的一生,把不同时期的苏轼衔接起来、贯通起来研究,为此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视角、更深厚的积累、更持久的努力,这样才能出更多、更好的成果。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们苏轼研究院今后努力的方向。

是为序。

2017年9月

目 录

序 罗承选

上 篇

永远的苏堤与黄楼

——苏轼徐州抗洪事迹的历史考察 蔡世华 (3)

劝农晴雨总关情

——苏轼在徐州祈雨与祈晴活动的文化遗迹及其启示 蔡世华 (18)

久长大计,通盘会算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中的地方治理思想探析 蔡世华 (30)

光明的使者

——苏轼徐州煤炭开发的历史价值再探析 蔡世华 (39)

奔走服勤,益修吏职

——苏轼徐州公务活动评析 蔡世华 (46)

对床夜雨听萧瑟

——苏轼与徐州逍遥堂 蔡世华 (62)

名山与高士,人地两相依

——苏轼与云龙山 蔡世华 (69)

可怜洪上石,谁听月中声

——苏轼与百步洪 蔡世华 (84)

吕梁自古喉吻地,万顷一抹何由吞?

——苏轼与吕梁洪 蔡世华 (94)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

——苏轼与徐州快哉亭 蔡世华 (101)



下 篇

近年来“苏轼在徐州”研究述评	邓心强 (111)
论苏轼徐州诗文之精神意蕴	李 贞 (120)
徐州地理环境对苏轼诗文创作之影响	林 月 (142)
苏轼题画诗的美学审视	李博文 (182)
苏轼、苏辙送别诗情感之比较	闫续瑞 王婷婷 (227)
苏轼对“斯文有传”文化使命的秉承与担当	管仁福 (243)
苏轼叙写“气”的语意蕴涵辩证	管仁福 (249)
遗爱千载苏徐州	
——兼论徐州黄楼的文化地标意义	管仁福 (257)
后记	蔡世华 (264)

上篇

Yiai Qianzai Suxuzhou



永远的苏堤与黄楼

——苏轼徐州抗洪事迹的历史考察

蔡世华

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期间组织抗洪保城的故事，已被传为千古佳话，在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中极具代表意义。如果把苏轼抗洪的历史记忆及其留下的大量文学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话，那么故黄河、苏堤、黄楼等则构成了与之相互辉映的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研究苏轼徐州文化遗存及其价值，需要对这两大系统加以综合考察。

在研究苏轼在徐州抗洪活动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徐州附近洪涝之患特别严重呢？据《徐州府志·舆地考》云：“夫山川巉阻之谓形，城郭控扼之谓势”。为此需要了解徐州城及其周边的山川形势与地理特征。徐州位于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地区，特殊的山川地理位置，决定了自古以来该地就多水患。《山川考》中云：“徐郡西南多山，东北多水”，“徐地强半平衍，北多沮泽，西南阻山”。这是就古代整个徐州地区概括而言的。具体到徐州府治所在地——彭城周边地区而言，则呈现另一种情形。笔者认为，苏轼在《放鹤亭记》中所说的：“彭城诸山，隐然如大环”更加形象而准确，即城区周边几乎都为山丘所围，四周郊野地势高爽而城区中间地势低洼。对此，苏辙曾以文学笔法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徐州四周的风景：

东望则连山参差，与水背驰，群石倾奔，绝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分披，鱼鳖颠沛，没人所嬉。声崩震雷，城堞为危。南望则戏马之台，石佛之峰，岿乎特起。下窥城中，楼观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骈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则山断为玦，伤心极目，麦熟禾秀，离离满隰。……北望则泗水淡漫，古汴入焉，汇为涛渊，蛟龙所蟠。古木蔽空，乌鸟号呼，贾客连檣，联络城隅。……

尽管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是徐州四周的地理特征与自然风貌还是非常典型而鲜明的。

据《徐州府志·山川考》介绍：徐州城正南有云龙山、户部山、泰山、奎山等逶迤起伏，西南则有大山头、丁塘山等；西北则有楚王山、九里山、龟山等；东南则有子房山、骆驼山、吕梁山等。古代著名的汴水自九里山南侧流入，经徐州城北向东，与自北向南的泗水（清河）交汇于城的东北角，流经城东，折向东南，穿越吕梁山区狭隘的河道流向下游的淮河。由于吕梁山区河道狭窄犹如壶口，自古以来，泗水流经此地时，“水中巨石巉岩齟齬，惊涛激浪迅疾而下”，形成了百步洪、吕梁洪等险要之处。苏轼《百步洪》一诗曾描写过其壮观情景：“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清代乾隆皇帝所写的《铜山县河神庙碑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河自达豫而下，逶迤入徐境，道狭而曲，势迅而易沓；过此复逶迤数百里，乃挟洪泽之波以出乎海口”。平时尚且如此惊险，一旦遇到上游洪水下泄，而徐州城东南出口不畅，积水在徐州城东迅速增加扩大，形成一片汪洋，而地势低洼的城区就陷入洪水的包围之中。如果水位继续增加，徐州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徐州城千百年来无数次发生河决城毁、人为鱼鳖悲剧的主要原因。所以，早有前人感慨道：“彭城，四战之国也，恒困于兵，圯于水”（赵明奇：《徐州府志》（新千年整理全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7~678页）。

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时空中，北宋政治家、四十二岁的徐州知州苏轼以自己的担当与作为，在徐州城市抗洪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自有史书记载以来，每次上游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几乎都会殃及徐州，但为什么徐州人民单单记住了苏轼任知州时的这一次呢？对此，需要进行一番历史的比较考察。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立国以后至熙宁年间，黄河决口造成灾害有十多次，比较严重的也有四五次。其具体情形及抗洪过程如下：

第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五月，黄河大决于滑州韩村，泛滥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由此一直向南，汇入淮水。太宗颁诏征发丁夫堵塞决口，但久而不成，治河官员建议，在黄河南北两岸各开一分支，分水引流，并设置斗门，根据水量大小“启闭随时，务乎均济”，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黄河洪水

泛滥问题，而且可以收到“通舟运，溉农田”的功效。但该建议未被太宗采纳。结果还是听天由命，竟派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船诣白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直到十二月的冬季枯水期，滑州的决口才被堵塞。这一年，徐州城外的清河上涨了一丈七尺，水流溢出大堤，为抵御洪水灌城，不得不把州城城门三面塞住。

第二次是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五月，河决于郟州王陵埽，洪流浮巨野、入淮泗。水势悍激，侵迫州城。尽管一个月以后决口就填塞住了，但由于淫雨不止，郟州城中积潦益甚，工部郎中陈若拙遂提出迁城建议，将郟州城迁徙到东南十五里阳乡之高原上，随后，朝廷颁文严禁盗伐河上榆柳，以保护黄河大堤。史书上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此次黄河决口对徐州城的影响，但洪水自巨野入淮泗，徐州是必经之处，势必对徐州城造成压力。

第三次是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黄河再次于滑州城西北天台山旁决口，不久又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洪水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郟，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即泗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共有三十二个州邑罹受水患。真宗复遣使为诸州提供薪石、榷榘、芟竹，并组织兵夫九万人治之。直到次年二月，决口始塞。这次黄河流经徐州达九个月之久，据《宋史·五行志》记载，洪水至徐州，与清河合，浸城壁，州城不没者仅“四版”。时任徐州知州王贻永，开始在徐州城南修筑河堤以抵御洪水。应当说，修堤护城之举，王贻永比苏轼做得更早。可惜《宋史》王贻永本传中对此语焉不详，后人难以了解更多信息。

第四次，就在决口被塞的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黄河再次于天台山下决口，洪水“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当时滑州知州陈尧佐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修筑大堤和叠埽于城北，保护州中居民；二是鉴于河岸泥土疏松，为减小水流冲击，“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三是复并旧河、开支流，以分导水势。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陈尧佐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后来苏轼在徐州的许多抗洪举措，就与陈尧佐的滑州抗洪有异曲同工之处。

此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四年(1071年)，黄河也发生过决口，宋神宗先后多次召集司马光、张茂则、韩琦等臣僚议论治理黄河水患，提出了各种办法，但成效均不大。综上所述，在苏轼之前，黄河水患一直存在，徐州城亦数次受其害，朝廷及徐州官员也有过各种抗洪治水的应对措施，这些都为苏轼后来的抗洪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而与上述几次黄河决口对于徐州城的威胁与危害相比，显然熙宁十年(1077年)的这场大水更加严重，情形更加紧急，苏轼的贡献也更为突出。



三

据《宋史·河渠志》载，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乙丑（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原来黄河已分南北二流，至此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复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郛、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这次大水抵达徐州城的日子是八月戊戌（二十一日），而此时距离苏轼正式上任徐州知州不过四个月。最初，苏轼似乎并没有在意，还与好友王巩（定国）、吕梁仲屯田等人相约重阳节聚会，然而等到九月初，情形就变得危险起来。关于当时情形，不妨看看苏轼胞弟苏辙的记述：

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屣屣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版。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仅有此一节记载，苏轼即可不朽矣！《宋史·苏轼传》几乎一字不改地采用了苏辙的这段记录。而征诸苏轼《奖谕敕记》和同时代的相关记载，可知其言不虚。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陈师道就是彭城人，他也亲历了这次水患。在《黄楼铭》中，他这样写道：“熙宁十年，京东路安抚官臣某稽首言：河决澶州，南倾淮泗，彭城当其冲，加以连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时，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余，下顾城中井出脉发，东薄两隅，西入沟洫，南坏水垣，土恶不支，百有余日而后已”。《奖谕敕记》亦有如下记载：“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当时情形之危急亦可以想见。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身为一州之长，苏轼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即根据史料及传说对苏轼抗洪事迹之闪光点加以评析。

其一，及时稳定民心，禁止富民出逃。从来遇到灾祸，人们能否稳定自若，往往决定着危害的轻重。人心稳定者，可转危为安；人心混乱者，则不惊自溃。

当此洪水汹涌而至、城墙危在旦夕、人心浮动不安之际，苏轼作为最高长官，压力与责任可想而知。这时的苏轼，不再是优柔寡断的一介书生，而是态度非常坚决鲜明的一州之长，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和“定心丸”的作用——“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充满了战胜洪水和一切困难的决心与信心，这该给下属和百姓多大的鼓舞和激励啊！“驱使复入”，看上去似乎不近情理，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此才能激发富民百姓与城市共存亡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禁止出逃的是富民而不是一般百姓，这是因为苏轼深知，普通百姓没有多少家产财富，即使大水淹了徐州城，他们也没有多少可损失的，而只有有钱人家才会竭尽全力保城，因为只有保住徐州城，才能保住他们的家产财富。

其二，调动军队抗洪，保障抗洪主力。苏轼严禁富民出城，但没有指望这些富民去抗洪抢险，因为他知道富民只要不出逃、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就够了。紧急时刻，真正有纪律性和战斗力的还是军队与保安组织。因此，他亲自调用武卫营的禁军（宋代禁军由朝廷统辖，是不得随便调动的），这些禁军士卒迅速集结，携带器械工具奔赴抗洪前线。可以说，调动军队参加抗洪，是苏轼指挥打赢徐州抗洪战役的关键举措，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力量。此外，苏轼还紧急征夫五千人，与士兵一道昼夜挖土作堤。卒长的表态，也从侧面反映了苏轼作为地方长官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感召力。

其三，提前修筑河堤，赢得宝贵时间。苏轼选择在徐州城东南修筑长堤，无论是在方位选择还是在时机把握上无疑都是正确的。一则洪水主要汇聚在东南方向，前面还有山丘高地阻挡，一旦洪峰回荡冲击，压力最大、最有可能溃决的就是东南方向的城墙。二则徐州城墙东南部分距离户部山、戏马台较近，可以利用地势之便，在外城内侧修建防洪堤，形成抵御洪水的第二道防线。对此水利工程的效果，陈师道在《黄楼铭》中评价道：“外为长隄，乘高如虹，以杀其怒；内为大堤，附城如环，以持其溃”。三则没有消极坐等，而是早有预见，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就让百姓预作准备，正如苏辙在《黄楼赋》中所记：“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积刍茭，完室隙穴，以为水备，故水至而民不恐”。这里更明确说明提前修建防洪堤，从而赢得了宝贵时间。“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其四，堵塞城上水窗，就近取土筑堤。在洪水尚未抵达之前，苏轼发现城墙上六个水窗，如不及时堵塞，洪水就会由此灌入城内，于是立即组织人力，用薪刍土囊从城墙外侧将水窗堵死；不久洪水汹涌而至，淹没水窗，但洪水的压力正好从外侧将填塞之物压住，而不会冲决；个别来不及提前从外侧堵塞的水窗，



在洪水已到后，从城墙内侧堵塞的效果都不好。与此同时，要修筑长堤，首先面临着从何处取土的现实问题。苏轼发现，徐州城中原有的取土坑都已经灌满了雨水，甚至与城外的洪水相呼应，实在是无所取土，无奈之中，苏轼决定从城南高地的一座古墓——项羽亚父范增之冢附近取土，因此得以在城中附城修筑长堤，巩固城基，提高一丈、长九百八十四丈。此外，苏轼还征调官家和私人船只数百，系缆于城墙下，以减少洪水巨浪对城墙的冲击。这些措施都是正确而有效的。

其五，组织水上救济，灾民得以存活。据苏辙《黄楼赋》记载，当洪水泛滥之时，“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即使有的壮年人逃到高地上或爬到树上，暂时躲过洪水，也会由于没有食物而饿死，倒悬于“丘陵林木之上”，实在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面对这种情况，苏轼组织水性好的人划着舟楫，装载着干粮糕饼，救济水中的幸存者，因此而“得脱者无数”。苏轼素有仁爱百姓、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情怀，此前在山东密州时，就曾捡拾收养不少弃婴，这种情怀在徐州洪水期间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其六，继续增筑故城，以利长远防洪。十月五日，城外水势开始减退，十月十三日，黄流一支回归故道，被洪水围困三月有余的徐州安然无恙。苏轼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但是苏轼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借鉴其他地方治理黄河的经验，于第二年正月奏请朝廷，希望一方面把原来的城墙加高加固，另一方面则在河道两岸用木桩修建“木岸”，大约类似于陈尧佐在滑州制作的“木龙”（其实，最初苏轼奏请修建的是石岸。据《与刘贡父》书简中说：“擘画作石岸，用钱二万九千五百余贯，夫一万五百余人，粮七千八百余硕”。苏轼认为：“虽费用稍广，然可保万全，百年之利也”。可惜这一极富远见的建议未获批准）。这一做法显然收到了效果。据史料记载，此后历经南宋、金代，徐州未再发生类似的大洪水。至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冬，为阻金兵南下而人为制造黄河决口事件，使河水自泗入淮，则另当别论。

其七，太守身先士卒，重树大禹风范。其实这乃是苏轼最令后人称道之处，也是取得抗洪胜利的关键因素。当洪水逼城、人心浮动的危难之际，苏轼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扛起抗洪保城的重任，真正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仁爱情怀。你看他“履屨杖策，亲入武卫营”；“执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在城下洪水汹涌之际，城墙之上恰是最危险之处）……凡此种种，都令人想起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情景。正是在郡守苏轼的示范带动下，徐州军民众志成城，战胜了这次特大